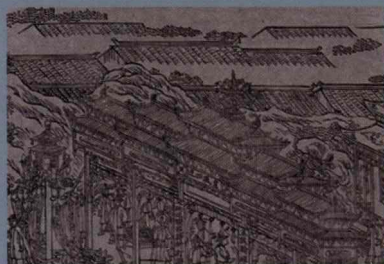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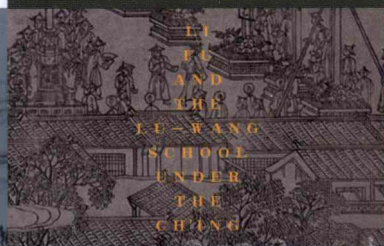
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

黄进兴 著

郝素玲 杨慧娟 译



剑桥中华文史丛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



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

剑桥中华文史丛书

黄进兴 著

郝素玲 杨慧娟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证和政治：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黄进兴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1

(剑桥中华文史丛书)

ISBN 978-7-5343-9237-5

I. 十… II. 黄… III. ①李绂 (1673~1750) —人物研究②陆王学派—研究 IV. K827=49 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2130 号

- 书 名 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
编 著 黄进兴
策 划 章俊弟 余晓灵
责任编辑 周方 吉祖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星光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电 话 025-57572528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42 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9237-5
定 价 12.00 元
批发电话 025-83657708, 83658558, 83658511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短信咨询 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551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序

余英时

李绂(1675—1750年)这个名字在西方鲜为人知。即使在故土中国,20世纪的学者们也不曾对他进行过充分的研究。据我所知,最早提到李绂的是梁启超,他曾于1923年在清华大学作清朝文史系列讲座时,首次称李绂为“陆王学派最后一人”。也许是受梁启超讲座的影响,我的后期导师钱穆在其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叙述李绂的生平及其思想。该部分至今仍然是中文相关著作中对李绂最详尽、最敏锐的描述。

20世纪中国历史记载上对李绂的忽略,与其说是源于李绂所处的历史环境,毋宁说是与历史学家们的思想心态有关。在民族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大潮中,对于与满族王朝以及理学哲学体系相关的儒家学者,中国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普遍持有偏见。结果是,当今对清朝学术史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汉学的考证学转变上,忽略了程朱与陆王流派。而李绂身为高级官员兼陆王学派发言人的双重身份,更降低了他在历史学家们选择顺序表上的排名。

然而,一旦跳出现代的文献框架对历史记载进行严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李绂还是陆王儒学都是清代学术史上不容忽略的研究对象,尤其是置其于特殊历史环境中。可以明确指出的是:李绂的学术影响不容小觑。第一,18世纪30年代初,在著名历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年)的协助下,李绂苦心孤诣,重修明代百

科全书《永乐大典》中的古籍，为四十年后皇家工程《四库全书》设立了榜样。正是这一工程把汉学推向顶峰。第二，李绂是清朝儒家学者中第一个公开批评前人对王安石（1021—1086年）及其变法的历史偏见的人。他对王安石的论著直接影响了蔡上翔（1717—1810年），后者倾二十年精力完成了一部详尽的关于王安石生平研究的著作。如此一来，虽非全部，至少大部分对此宋朝伟大改革家的错误批评第一次得以纠正。在蔡上翔工作的基础上，梁启超于1908年撰写《王安石传》，此书大大推动了革新思想的传播。因此，李绂对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作出了间接贡献。第三，从其去世的1750年至清代末年，李绂的名字从未被遗忘。许多19世纪作家或著述其政治生涯，或著述其学术造诣。实际上，李绂百科全书似的渊博知识以及过目不忘的超人记忆被广为传颂，有时甚至被赋予传奇色彩。1831年他的全集重印发行，同样证明了他在学术界的持久影响。

正如梁启超所言，李绂很有可能是清代最后一个公开宣称自己属于陆王派阵营的学者。但这绝不是说在他1750年离世后陆王传统就全盘崩溃了。相反，陆王传统继续存在着，尽管没有代言人，尽管没有公众认可的身份。换句话说，即便是在汉学的全盛期，陆王理学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学术界的影响：不时地有著名学者如章学诚（1738—1801年）等宣扬陆王学派的方法整体论；又如焦循（1763—1820年）等努力对王阳明的良知说赋予自己时代的新定义。到19世纪20年代，陆王理学学派似乎对程朱弟子构成了威胁，如方仲舒（1772—1851年）就极其迫切地警告自己的同代人：随着汉学的道德崩溃，陆王学派将重新兴起。他的预言尽管没有即刻发生，但其后来得以证实。六十年后康有为在广东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学院，发起教育革新，陆王派思想学正是经过其修改的儒学课程之核心。

对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的成书研究无疑在很早以前就该进行

了。如今，随着黄进兴博士的研究成果的发表，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空白终于得以填补。从黄博士研究的最初构思开始我就一直密切关注其过程，在此我很乐意略提此书之杰出贡献，将个人理解与诸位读者一起分享。

首先，我想作者应该为其背景研究的独创性受到褒奖。此书思路开阔，李绂被最大限度地置于历史背景意义中。在学术史领域，对背景研究的操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纵向历史研究，一种是横向同代研究。作者首先把李绂置于“朱陆之争”的背景中，纵向从此问题的历史起源，一直研究到 18 世纪末的章学诚。结果，此书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学术传记，而更可以被看做是一部精简的理学历史，视角特别，叙述娴熟。同时我认为，前两章“有史之争”是有关朱陆双方哲学分歧的最明晰的阐述。作者完全使用两派自己的术语对其争论进行分析，从而抵制了当今将西方哲学词汇引入理学的流行做法。

与此同时，作者把李绂与朱陆之争置于清朝中期的学术主流背景中。第六章“李绂与考证学转变”，在我看来是个极好的个案研究。它研究的是，理学家们的哲学争论是怎样与考证学的兴起相互作用、彼此牵连的。清朝考证学主要是建立在对文本进行哲学解释的基础上。在当今西方文章中常把“考证”一词简译为“philology”。因此读者应该注意，作者在此书中讨论“哲学”与“考据”的关系时，主要讲的是作为哲学传统的理学和 16 世纪末兴起的考证学。我也遵从此用法。

“考证学转变”作为一个学术运动是由复杂的历史状况引发的。无需多言，对这一运动的充分叙述需要历史学家对明、清转折时期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进行彻底研究。只讲学术史远不能完成这项工作。然而有趣的是，在理学哲学传统中，“朱陆之争”的演变本身却引发了“考证学转变”。早在 16 世纪，王阳明在他与朱熹的重要哲学论战中，十分致力于所谓《大学古本》的重建。这样，也许

是在无意中，王阳明使自己陷入了文本和考证研究，由此为许多有哲学思想的学者设立了榜样，使他们投身于儒家文本的考证实践。另一方面，王阳明在“朱陆之争”中的知名对手罗钦顺（1465—1547年）也鼓吹“追溯本源”是解决哲学争论的重要途径。为捍卫朱熹“性即理”，反对陆象山“心即理”，他引用数段典籍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这样总结：如果有人搞研究而不在典籍中寻求证据，那将是全然武断的、固执的，难免要步入歧途。这里我们看到，最初哲学是如何把自身推向了考证学。

黄博士通过对李绂著作的详尽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清朝考证学全盛前夕，陆王儒学“考证学转变”的具体例证。在李绂个案中，“朱陆之争”只能通过考证学方法，而不是哲学方法去解决。黄博士在此方面令人敬慕的成功基于一个重要事实：他是第一个充分有效利用了李绂《朱子晚年全论》的当代学术史家。这本书长期以来一直非常珍贵，研究者，包括我后期导师钱穆先生都无法得到。黄博士使我们相信，李绂论文依据的基础相当薄弱。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作者的话说，“李绂把朱陆之争从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一个考据问题”。在此语境下，我可以从另一方——朱熹一方——支持黄博士严密建立的案例。当时朱熹派领导人物王懋竑（1668—1741年），为了直接反对李绂，致力一生编撰了一本详细的《朱熹年谱》。他得出结论，朱熹在学术生涯中，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都丝毫没有表现过向陆象山哲学分歧妥协的迹象。后来的评论家一致认为，尽管由于王懋竑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而造成了一些缺陷，这一传记可谓考证研究的最好作品。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在程朱派内部，朱陆之争也同时进行着同样的变化。

最后，黄博士在第七章将李绂和理学置于清初的政治背景中。他笔下描述的康熙皇帝对道统的占用着实引人入胜。显然，皇朝内以李光地（1642—1718年）和李绂为代表的程朱和陆王两派的理

学家们，主动将道统拱手让与康熙。为了给自己辩解，他们机智地从意识形态下手，指出，道统与治统分离三千多年之后，现在终于在康熙圣君身上实现了再次统一。那么，有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理学家们在心态上的突然转变呢？黄博士在对诸多历史文献与文本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敏锐的观察结果。下面我将补充一些我恰好了解的相关事实，以点明黄博士最重要的一些研究发现。

第一，黄博士指出，李绂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皇上确实有着“神圣”的品质，这一点是正确的。康熙引人注目的公众影响及其在宏扬儒学的诸多功绩都证明了李绂对康熙的这种特别敬仰是事出有因的。甚至陆王派杰出人物、明朝的忠实拥护者黄宗羲（1610—1695年）也在一定程度上怀有李绂同样的崇拜。黄博士引用了早在1686年黄宗羲在致友人的信函中对康熙的褒扬。我补充一点，在该信中他也称康熙为“圣君”。

第二，根据作者的学术评论，康熙“特别清楚实行儒家仪典的重大意义”。他引康熙1684年在曲阜祀孔为证。此次祀孔，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向圣人孔子致以空前的敬意。从文化史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有着特别意义的事件，值得作一详述。

康熙曲阜祀孔发生在1684年底，康熙第一次南巡的归途中。之前皇帝在苏州、南京驻留数日，在南京时就亲自祭祀了明太祖陵。另外，最近公布于世的一份见证也生动记载了1684年12月初康熙在苏州的活动。上海当地历年志中也详细描述了康熙在佛教寺庙前与当地百姓的会面。康熙甚至同和尚们一起当众演奏乐器。更让人兴奋的是，当百姓们高呼“皇上万岁！”时，皇帝也面向人群，高声回应：百姓们好！

上面提到的康熙在1684年举行的三次仪典似乎在明显地传达一条政治信息，那就是：全中国在圣君仁治下实现了天下太平。皇帝通过孔庙跪拜、明陵祭祀这些活动告诉中国儒士，他是

道统和治统的合法后裔；他还以当众奏乐的方式告诉百姓，他是孟子口中“与民同乐”的理想儒家君王。礼乐一向是儒家符号的中心。一个年仅三十岁的年轻满族皇帝对儒家符号的操作能够达到如此娴熟的程度，实在令人惊奇。我故意用了“操作”一词，意在指出，尽管康熙帝在公众面前有意塑造了儒家孜孜学者的形象，但他从未真正放弃自己的满族身份。他的这些所作所为都出自政治操作的需要，而非虔诚的信仰。只要明白他1684年第一次南巡的意义，这一点也就很明朗了。一年前台湾归附，三年前三藩叛乱平息。中国再没有任何力量能与此新王朝的正统权威相抗。康熙太了解中国历史了：重操儒家标志、促进天下太平的时候到了。上述黄宗羲和当地方志的例子已经证实，康熙皇帝的操作应当被认为是成功的。在康熙首次南巡之后，汉人的排满情绪都明显平息了。

黄博士对清朝儒学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忧郁的语调中结束了，这点可以理解。拥有圣君的代价竟是要付出儒家的批判尺度，这的确令人沮丧。特别是对于身处皇室的儒家学者们。正如章炳麟(1867—1936年)指出的那样，曾经在明朝身负要职的“谏官”，自1723年，康熙死后仅一年，就完全缄口不言了。因此，从这个体制角度来讲，黄博士的观点是毋庸争辩的。然而，至于那些与皇权联系甚微的儒家学者，要完全剥除他们的批判功能是很难的。其原因不难解释。这些儒家批判者通常是迈克·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其《诠释与社会批判》中所称的，“连贯”批评家，他们的批评空间是用英寸来衡量的。沃尔泽告诉我们，“连贯的”批评家可以通过诠释的方法建立批评空间。“他们只要从事学术工作，就为对手开辟出社会批评的道路。”在清代中国，戴震(1724—1777年)可以说是这种“连贯”儒学批评家的经典例子。通过对儒家“理”概念的新诠释，他大胆质疑官方支持的程朱理学的合法性。他说：“同情有时会用以被依法处死的人，但是谁会同情一个以道

德名义被处死的人呢？”从这一点来看，无论缔造得多么坚固，道统和治统的结合永远不可能是完整的。

1995年7月
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

致 谢

最初余英时教授建议我选择李绂作为论文主题时，我甚至不知道李绂是谁，怀着好奇心，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我对李绂以及相关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最终，这一学术研究使我获益匪浅。在整个过程中，余教授给予了我宝贵的指引。

在我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本杰明·施瓦兹教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与他的讨论总能开拓我的思路，他在我的手稿上的批注也非常有益。不仅如此，施瓦兹教授和余教授的言行堪称优秀学者的表率。他们非常亲切耐心地帮助我克服在哈佛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承蒙施瓦兹教授和余教授的惠泽，我衷心地表示感谢。这本书正是基于我在他们指导下撰写的论文而成的。

回顾在哈佛的这些岁月，强烈的求知氛围激励着我，各种西方思潮冲击着我，对这些西方思潮的理性批评反过来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我相信，在哈佛的经历会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感谢我的老师们，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的林毓生教授，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亚利桑那大学的鲍家麟教授、陶京生教授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杜维运教授。

他们不断的支持和鼓励赋予我力量来完成此工作。我同样还要感谢杜维明教授,他在读了我的手稿之后给予很多好的建议。陈荣捷教授和弗雷德里克·默特(Frederick Mote)教授在读过手稿之后也慷慨地给我鼓励。在将论文改写成书的过程中,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田浩(Hoyt Tillman)和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好心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杜教授和田教授还针对语言进行修改。

霍乾(Chien Ho)、黛博拉·怀特(Deborah White)和西德尼·泰(Sidney Tai)在我使用哈佛燕京图书馆资料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帮助,给予了让人难忘的友情。1985年,我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的朋友渡边宏教授和吴密察教授在我使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东洋文库的藏书时给予了帮助。

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非常慷慨地为本书在1986年的完成提供了资助。毋庸多说,我更应该感谢我的单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纯研究与讨论的传统早已蔚然成风。我从这样的学术精神中受益良多。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成就了我在学术道路上有意义的探索。

引 言

本研究将会对清朝早期的整体学术气候作一解说,探讨在当时清朝统治下的政治与文化特色。向着这一目标,我把重点集中在陆王学派研究,特别关注这一学派在清朝初期的卓越代表李绂(1675—1750年)。至清初,陆王学说已经历了数代变革,李绂的思想可以被视为陆王学派对程朱学派的最终答复。清初统治者和学者都普遍谴责的王学“左”派自明朝以后就一蹶不振。但李绂则成功证明,即便在明朝以后,身为陆王学者依然可以钻研学术。换句话说,陆王学术并没有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终结。

身为陆王学者,李绂强调的是心对德性的改造作用,而对读书持批判态度,尽管他没有完全把读书排除在道德完善过程之外。在陆王学派与其对手程朱学派的诸多分歧中,有一点就是他们对读书在德育中的作用持不同看法。程朱学派认为,读书在德性修养中有着内在的积极价值。

尽管有着这些分歧,在清代,无论是陆王学者还是程朱学者都把考证视为为自身学说辩护的有效方式。在此之前,彼此的争斗主要围绕在哲学思考的范围内。迫使陆王学者拿起考证这一新武器的,或许是由于学术思潮从“尊德行”向“道问学”的转变。简言之,考证学转变发生在晚明和清初时期。

重现陆象山(1139—1192年)与朱熹(1130—1200年)的哲学争论,明显可以看出,对“心”之本体的不同假想造成了二者最大的分野。按照这一理解,其他的差异,如读书是否有益于德性的问题,主要也是源于他们对心之本体的不同假想。

诸多政治及学术因素造成了朱派的壮大和陆派的衰落。朱派

施给陆派的压力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学术上,朱熹生平创立的学说及其对经典的注释吸引了庞大的追随者;能够在旨在毁灭他们的政治肃清中得以逃生,他们信念得到认可与支持的程度可见一斑。而相对应的是,陆象山的哲学在其逝后很快便失去了影响。读透了他们的学说,这两个学派兴衰沉浮的学术原因便不难辨别。

不仅如此,自南宋晚期,朱熹的学术地位受到政府的保护而且成为一门官学。在元代,朱熹对经典的评注更是用于选拔考生的标准。因为朱学内容成为通过科举考试的“必要条件”,学子们致力于朱熹学说的热心与他们对官职的渴望融合在了一起。正因为如此,孔尚任悲叹地说,大多数学子拥护朱熹而攻击陆象山仅仅是因为朱熹的批注可以在科举考试中派上用场。^①

这一趋势并不能使一个真正为学术和道德启蒙而学习的学者止步。王阳明(1472—1529年)也许正是这样一位哲学家的典范。他从两个方面抵制当时流行的朱熹热。其一,通过与朱学的一系列学术较量,他最终形成了一套德行说,即把内心当成道德的直接源泉,与朱熹哲学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为了减轻自己的精神压力(这压力一方面由于他觉得曾在学术上受惠于朱熹学说而怀有亏欠感,另一方面由于朱派学者反对他新理论的倡导),王阳明重修了《大学古本》,为自己的“格物”说辩护。另外,他撰《朱子晚年全论》,力图表明在他的学说与朱熹学说之间并没有根本差别。阳明的这两部著作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直延续到清朝。

这些争论的内容所针对的无疑都是程朱与陆王二派的哲学立场,这些争论的形式则见证了考证方法的兴起。^② 作为清朝的一个陆王学者,李绂不仅与朱派学者就哲学问题辩论,而且还使用考证学为武器与朱派论战。

① 孔尚任:《湖海集》,上海,1957年,第9章第203页—204页。

② 这一论题最初由余英时教授提出;参见其《历史与思想》,台北,1977年。

尽管我们看得出宋儒与早期清儒在思想上有着潜在的学术延续,但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却发生了微妙却是根本的转变。康熙皇帝执政以前,尽管有着学术分歧,但是程朱与陆王二派都认为“道”或“道统”可以用于批判政权和统治者。然而“道”的这一批评尺度在清代学者(除了一些明朝遗老)的头脑中最终消除了。

李绂这一清初陆王学派的重要战士,是学者中反思当时学术与政治变化的一个典范。对他生平及思想的深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阐明政权机构如何成功篡夺了“道统”原先的独立性。而且,李绂证明了一个致力于陆王学派的文人同样可以身为官方学者在异族朝廷下任职。最后,他的思想也是朱陆之争如何导致了考证运动的一个例证。同时,我还会在需要时比较详尽地论述陆王学派的对手程朱学派,以便更明朗地阐释陆王学派。

目 录

序	余英时	1
致谢		1
引言		1
1 有史之争(1):“朱陆异同”的哲学诠释		1
2 有史之争(2):王阳明与“朱陆异同”		22
3 儒家思维的批评尺度:政权批评的基石——道的概念		44
4 清代陆王学者的典范:李绂(1)——生平		59
5 清初陆王学派的典范:李绂(2)——思想		72
命的概念		72
道的特点		79
心、性、理之间的关系		85
李绂的格物说		95
6 李绂与考证学转变		102
《朱子晚年全论》:朱陆异同的实证研究		102
陆象山的学术传承:学谱建设		112
李绂与经典研究		125
7 拥有圣君的代价:康熙皇帝统治下政治机构对道统的同化		138
李绂对清政府的认识		139
圣君出世:康熙对道统的占用		143
道治合一的含义		152
结论		163

1

有史之争(1): “朱陆异同”的哲学诠释

1175年，朱熹（1130—1200年）与陆氏兄弟——陆九龄（1132—1180年）、陆九渊（象山，1139—1192年）应吕祖谦之邀相会于鹅湖寺。吕祖谦意在调和双方相持已久的意见分歧。此次辩论的主题后来成为理学历史上的主要对话论题。这次辩论无论是对于参与此次辩论的哲学家，还是对于那些后来发展了理学的人，都有着重大意义，因此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以探寻其深远意义。

赴鹅湖之前，陆氏兄弟就彼此交换了看法以达成共识。最后兄长九龄同意了弟弟象山的观点，并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思想：

孩提知爱长知钦，
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
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
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磋，